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农思想新论

蒋国宏

(南通工学院 社会科学系,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问题尽管认识不尽相同,有重农抑商派、工商立国派、农工商并重派等,但他们都看到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主张把它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重视农业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并且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农思想;地位;原因;特点

【中图分类号】K21; S-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4459(2004) 04- 0072- 09

New Research on the Thought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of Modern China's Intellectuals

JIANG Guo- 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226007)

Abstract: The thesis classified the views of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on agricultural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irst, and then made a probe into their cause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put forward several distinguish features in the end.

Key words: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thought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status; distinguish features

重农思想早在西周以前即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便成为中国封建政权奉行不替的据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发,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经世务实作风的广大知识分子在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同时“取西方文明之公器”,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农业。过去人们虽然进行过一些个案研究,但却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笔者抛砖引玉,以加深这方面的研究。

一、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的不同认识

重农问题往往是与如何处理农商关系密切相联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思想,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也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举措。鸦片战争后人们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就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农本商末,重农抑商

由于历史的惯性,鸦片战争后“重农抑商”观点仍然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比较突出的当数谢阶树、刘锡鸿和章炳麟。

谢阶树认为农为本,商为末,本业仅“与地争利”,而“末业”却“与人争利”。“与地争利曰本富,其利

* [收稿日期] 2003-12-13

[作者简介] 蒋国宏(1966-),男,江苏如皋人,南通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学报编辑部副主任,硕士。

均;与人争利曰末富,其利偏。偏则争,争则困,困则穷。夫本富则农是已,末富则商贾是已。……凡物,出于地者无穷,出于人者有制”,“食出于农,衣出于工,财货出于商。无财货则贫,无衣则寒,无食则死。三者食为急,故农尤急”。因此他主张重农抑商,提出“致富莫如劝农,而保富莫如抑商”,并提出“严市禁”、“贱商人”等具体抑商的办法。^①

刘锡鸿认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是进行生产的,而工商业不能生财,只有“务本”才能“生物多”,“富足所由致也”,相反“商贾多而仕宦众,为害之最甚者”,因为“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诱致人财者也;……取之易则去之亦易……而人之见而效尤者,又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于乡里间巷”。最终造成“民财皆空”的局面,^②因而必须实行抑商的政策。

章炳麟认为发展工商业必然会削弱农业,因此从本国国情出发重农必须抑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避免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啸山林的局面,说“汉土之民,生殖繁而食量巨,一有不给,千里转尸,故自古以重农为国,是非好为迂阔,以情势异于诸方也。商日益横,工日益多,农日益减,稔岁已忧其不饱,猝遇虫蝗旱涝之灾,拙者饿死,雄桀转徙他方为寇盗,甚至揭竿噪哗。”他主张实行“贱商”的政策,剥夺其政治权利,甚至用“额帕白巾,两足异履”的办法污辱其人格。^③

(二) 商标农本,商宜先行

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面临新的形势,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优先发展工商业才能塞漏救贫、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其主要代表是魏源。

魏源把农业所生产出的自然形态的财富(“食”)视为本富,而把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财富(“货”)称为末富,认为农为本,商为末,农业优于工商业,只有农业才能使国家富裕,秘鲁“恃地中有宝(矿藏),不屑耕稼,怀金而啼饥”,美国产谷棉而以富称,因此“金玉非宝,稼穡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④他根据鸦片战争后的情况认为货更应优先解决,“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⑤

(三) 工商立国,农为补充

王韬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惠商、助商政策,以实现国家富,“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⑥他还对阻碍工商业发展的“重本抑末”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重农”只不过是其幌子和借口,并未落实到行动之中,真正目的仅仅是要催科取租。“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干旱,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⑦再也不能死搬“重本抑末”的教条,而应效法西方,“以商为国本”,发展工矿交通事业。

薛福成认为当今世界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中外联属之天下”,在中国古代,商列四民之末,而今则“握四民之纲”。^⑧如果说在华夷隔绝的朝代应“崇本抑末”、“以耕战为务”的话,那么今天则须“以工商为先”,调整和摒弃重农轻商的政策。

① 谢阶树《保富》,《约书》卷8,第5-6页。

② 刘锡鸿《刘光禄遗稿》卷2,第10-11页。

③ 章炳麟《五朝法律索隐》,《民报》第23号。

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61,第15页。

⑤ 魏源《军储篇一》,《圣武记》卷18,第31页。

⑥ 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园尺牋》第85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⑦ 王韬《兴利》,《园文录外编》第3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⑧ 薛福成《变法》,《筹洋刍议》第46页。

郑观应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①虽然他所说的商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商业部门,但仍以之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中心,认为无商则士农工皆弊,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益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国民之纲顶也,商之义大矣哉”^②。有鉴于此,政府自应除“困商之政”,行“保商之法”。陈炽认为“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1](P232)}。

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③,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而“无敌天下”。

但是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强调应以工商立国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农业,视其为可有可无之物,相反,也看到其重要性,主张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业。如王韬主张驱游民而归之于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采用新式农业机械来发展农业生产,马建忠主张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农作物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陈炽认识到农业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1](P232)}因为农业可为工业提供原料,同时农产品本身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与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还指出:“人徒艳西国工商之利,而不知法、德、奥、意诸国,其国之大利,皆在于农。”^{[1](P152)}他主张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讲求农学,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方法,以发展中国农业。

(四) 先农后商,农商并重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沿用了本末的范畴来论述农业和工商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但却并不包含有轻视工商业的意见,相反认为它们与农业一样重要,迫切需要发展,都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门,严复、张謇、孙中山等即是其杰出代表。

严复认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提供剩余则工商各业都将无法存在,“盖地为百产之宗,使耕牧树畜者,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尽,其他工商事业乌得立乎?”^{[2](P96)}因此必须“以农为本”,但这并不意识着因此可以轻视工商业,因为它们“固皆相养所必资”“于国为并重”,“理实有本末之分”,但决不能贵本而贱末。^{[2](P66)}

张謇曾经明确表示“天下之大本在农”^{[3](卷2,P11)},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3](卷2,P13)}因为“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3](卷3,P202)}正是从农业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程序,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起点的角度,他才赞同农本商末说:“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贷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也;商为之馆榷,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3](卷3,P820-821)}。与此同时,张謇并不抑商,他认识到“无工商则农困塞”,^{[3](卷5,P151)}并按治水当从下游着手的逻辑,提出:“大本在农,而入手在商。”^{[3](卷2,P11)}总之,农、工、商都是十分重要的,各有不可替代之功能,它们“义有先后而无轻重”。^{[3](卷5,P151)}

孙中山认为农业与工商业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4](卷1,P6)}

二、重视农业的认识根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主张重视农业,发展农业,但他们重视农业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业衰落现状不能满足救亡图存的要求,而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又使人们看到富民强国希望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商务》。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商务二》。

③ 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国弱民贫,中国民族面临深重的灾难和严峻的考验。因此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要抵御外侮则必须发展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部门之一的农业显然重任在肩,遗憾的是传统农业因为外国列强的侵略,政治体制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自然灾害频仍等多方面原因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所谓“农政失理、物产不丰;杼轴其空,十室而九;树艺之经,阙而不讲”,无疑是其真实写照^①,就连刘坤一、张之洞也不能不承认:“近年工商皆有进益,惟农事最被,有退无进。”^② 农业的落后,是与国家独立富强的要求所不相适应的,张謇感叹:“今以抚有四万万人口之中国而衣食所资事事仰给外人,虽欲不贫,乌可得已”。^{[3] (卷3,1789)}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革命的馈赠,改造传统农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起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他们在艳美其科技兴农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和可观收益。冯桂芬强调“裕国”首先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他主张发展蚕桑、丝、茶等商品性农业以出口海外,杜因鸦片和其它洋货进口而形成的严重“漏卮”,挽利权,他甚至把茶、桑等称为“富国之大源”。^③ 张謇估计“以中国今日所有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达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白银。^{[3] (卷2, P13)} 孙中山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致富,原因在于做到了“无遗地利,无失农时”,而中国当时则“地有遗利,民有余力”,颇有潜力可挖,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能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4] (卷1, P10)} 通过引进国外的机器,学习其科学方法,局面会大大改观。“农学既明,则能使用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疑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疑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谨之忧矣”。^{[4] (卷1, P11)}

(二) 农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

民以食为天,而食主要或归根到底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另外,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衣住行等都离不开农业,可以说,发展农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张謇指出:“必稼穡兴而后衣食足”,甚至“住所需亦农之类事而及于工,所需则取于给人衣食之值可以赅之”。^{[3] (卷2, P13)} 农业不发展,农民衣食无着必然影响社会稳定,也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安定局面。鸦片战争后传统农业的衰落,造成农民极端贫困,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成为妨碍社会稳定的隐忧,可以说,许多人考虑农业问题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封建政府之所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即着眼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维护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及由此建立的封建专制统治。当然社会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备受重视。张謇坦言他建立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除了为国家增辟财源外,就是为了“奠海滨数千户浮惰无业之贫民”。^{[3] (卷3, P628)} 穆藕初指出:“无农即无工商,无工商即无生利之途,而国无于立。故立国之道,首在务农,衣食足而后可以言治安”“民以食为天,古来善治国者,莫不以足食为务。足食则民生遂,教化行,礼义廉耻四维乃张”。^{[5] (P129)}

(三) 满足工业、商业等行业发展对农业的客观要求

诚如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那样,农业与工业、商业等有着至亲至密的关系,农业的发展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否则就不能提供原料、资金以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陶煦从农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市场购买力的角度认为农业是“本业”,主张重视农业,他说,“农有余财,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工贾利也;市集有余财而转输于都会,而都会之工贾利也。导源而流治,纲举而目张,此类是也。”^④ 而且随农业发展造成的普通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工商及其它各业更加有益,因为“使所余而在绅富,将并百千农家日用之数举归之一家,一家之日用止

① 《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013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③ 冯桂芬《筹国用议》,《校颁庐抗议》卷下。

④ 陶煦《租核》第5页。

此也,即或所用有加,不过纵其淫奢末流之务,而岂若有余在农者之遍利乎不耕之民哉!”^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所带来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所带动的工商业的发展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农村生产责任制实行引发的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事实无一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穆藕初等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为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以制胜。麦子不改良,麦粉出数何以丰富,蚕桑不改良,丝茧产量曷望增加。举一二以概其余,知改良农产,实为当务之急”^{[5] (P162)}。其次,农业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起点,“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3] (卷2, P202)} 张之洞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②

(四) 缓解人口多耕地少的巨大压力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客观地说,人口激增,耕地减少或增速较缓也是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绝非虚枉或矫饰之词。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以来的人口激增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客观上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时人已有评述。汪士铎曾言:“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③,“使减其民十六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④ 撇开其认为人口减少十六七即会家给民足的逻辑缺陷和简单化不论,也不去追究其减少人口措施(溺女婴、战争)的残酷和不人道,仅从其揭示人口增加与农民生活水平相关而言,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据史料记载 1741 至 1790 的五十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大约一倍。自 1790 至 1850 的六十年中,尽管因有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而引起的人口非正常大量死亡,全国人口仍增长了 40% 左右。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和国内农民起义,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⑤,人口增幅减缓,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上,20 世纪初有 4.3 亿,到 1949 年,中国人口已有 5.4 亿。但由于土地荒芜,因此农业生产衰退,有限的耕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人口数量已超过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承载的极限,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已呈绝对下降的趋势,这又不能不引起社会经济的病变。谭嗣同就曾经指出:“夫治而乱其必有大不得已之故。”最重要的“无过人满”,“地球之面积无可展拓,而人类之蕃衍代必倍增,所产不敷所用,此固必乱之道也”,所以他提出“地球之治,必视农学为进退”,即通过讲求农学,挖掘农业发展的潜力,以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8] (P365)} 孙中山说中国“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鄙可预决者”。^{[4] (卷1, P25)}

(五) 弘扬勤劳节俭的美德

不可否认,在“重农”的思想根源中也有一种过去人们鲜予提及的,即是对农民辛勤劳动的一种肯定和褒扬,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谢阶树提出:“夫本富则农是已,末富则商贾是已。农者自安作息,终岁勤劬,人皆贱其业而不恤;奸商黠贾,操其奇赢之数,不劳四体而利擅王侯,显荣逸乐终身,人皆慕效之,故背本而趋末也。”^⑥ 刘锡鸿认为:“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所以劝德行而立致治之本。”^⑦ 因此“重农抑商”有助于弘扬辛勤劳动、诚实经营的美德。

① 陶煦《租核》第 9—10 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 32 第 39 页。

③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 3,第 28 页。

④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 2,第 29 页。

⑤ 近代中国灾荒发生之频繁,受灾地区之广,灾情之严重使人触目惊心。李文海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对此提供了大量资料。

⑥ 谢阶树《保富》,《约书》卷 8,第 5—6 页。

⑦ 刘锡鸿《刘光禄遗稿》卷 2,第 25 页。

三、重农思想的基本特点

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农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 兴农与重农相联,实践与思想并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传统农业的衰落,不忍坐视民族沦亡,大声疾呼要重视农业以重振其雄风。但他们大多数已清醒地看到传统农业已无法起衰振疲,唯一出路便是实现其近代化,因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和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

重农是兴农的逻辑起点,兴农则是重农的必然选择。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兴农停留在口头上而且付诸实践,张謇曾说自己原本很崇拜程朱,后来研究其历史发现他们尽是说而不做,因而决心要“力矫其弊”。他在丙戌会师报罢后“即谓中国须兴实业,其责须士大夫先之,因先事农桑”。^{[3] (卷6, P864)} 他帮助其父购湖州桑苗,向乡民发送《农桑辑要》,劝导他们植桑养蚕。大生纱厂站稳脚跟后他便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股份制农业公司,开学习西方先进组织之先河,经过10年奋战,终获成功。昔日无一缕炊烟的苏北沿海荒滩变成了“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裹布,行有徐梁”的一个新世界。^{[3] (卷3, P385-386)} 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业工商总长期间制订政策,颁布法令以扶持和奖励农业发展。罗振玉秉“农为邦本”之古训,鉴于中国以农立国,因农业不振导致国家贫弱的事实,决心以实际行动振兴农业。他除了学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外,还阅读了不少欧洲人所著农书。1896年,他和蒋伯斧共同筹资在上海创办“学农社”,以翻译欧美和日本农书,还出版《农学报》,传播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后来他又参与张謇通海垦牧公司的筹建,并因张之洞之邀担任湖北农务学堂总理。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后发现“在诸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富强。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国存,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为研究农业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5] (P17)} 他于1911年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1913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不久进入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研究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硕士学位并回国。他还曾租地60亩,历时五载,从事棉质改良之研究。

(二) 重农立场相同、程度各异

尽管不少知识分子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重农抑商”,但可以说,他们均不轻视农业,在重农的问题上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立场的对立,即使激进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也不例外。从政治立场上看,他们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个人经历和身份看,有政治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也有思想家如王韬、陈炽,也有实业家,如张謇、穆藕初等。实际上他们反对的仅是因重农而抑商,只要不抑商,那么重农并无不可。

但是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重农”,他们中除个别人仍想维护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统治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众所周知,通过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也唤醒了少数知识精英,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们开始了痛苦的认识和取法“夷人”长技的不归之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长于技艺的认识阶段后,知识精英们看到国富而后能强、国富才不会被灭亡。那么,中国怎样才能扬己之长、克敌所短呢,中国的富源又在何方?冯桂芬、郑观应的“以商立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康有为、梁启超的使中国“立为工国”,张謇、孙中山的农工商并重并进等都无不折射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救亡方案的抉择。

(三) 他们在重农问题上实现了四个并重

其一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主张要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着眼于改变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衰微的现状,而那些主张要发展工商业,改变抑商政策的思想家们也是看到单纯依靠农业无法改变中国贫农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如严复说:“波兰、俄罗斯、西班牙、波陀噶尔

诸邦,舍农而外,几无余业,而皆不富,且进治极迟”。^{[2](P96)}

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农业是解决人们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的特殊生产部门,人们不仅应着眼于经济效益,还应注意社会效益。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因而具有战略意义,否则必然会造成大量流民存在,甚至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局面。这不仅是封建专制统治者要设法避免的,也是广大农民及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不希望看到的,是违背和损害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其二是重农兴农与戍边卫国的统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既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又面临着社会危机。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沙俄、日本、英国等对我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及台湾更是觊觎已久,必欲得之而后快,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增长缓慢,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在边疆地区则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土地,因此,许多知识分子主张移民实边。这样既可促进边疆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可巩固国防。1876年,左宗棠率军入疆,平定叛乱,阿古柏逃遁,有识之士认为,新疆“恢复不难而休养生息之为难”。他们主张“抽调旗兵屯田新疆”,认为,“欲固边陲莫如大兴屯田,欲兴屯田莫如抽调旗兵”,把它视为“当今之先务”。这样做可以一举多得,一是可缓解八旗“生计日艰”的压力。旗人生齿日繁,旗丁人口逐年增加,抽调旗兵屯田新疆,旗民可“得肥饶之田,身家自能渐裕”,对国家而言可减额设之饷,度支亦可稍纾;二是可练“满洲劲旅”,“建仓积谷以济军粮”,因而有利于“固吾圉”;三是“垦关外之荒,商贾可出而谋利”,“兴屯不独有益于边方”,邻省“土民亦可安居乐业”。^①1912年3月,黄兴发起在苏州成立了旨在促进垦植事业的拓殖学校,其目的就是要“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因西北之边际。杜绝列强抵隙蹈瑕之机,实行吾倚移民殖边之策”^②。

其三是中西文化并重。传统只能超越,而无法抛弃和忽视。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传统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迹。就对农业的重视而言,人们也很容易发现他们承继了古代重农的传统,看到了农业在满足人们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中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以及对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重要意义,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求稳怕变,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等心理痼疾。屯垦戍边等也可明显地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远非往昔可比,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门洞开后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睁开惺忪的睡眼,打量这光怪陆离却颇为精彩的外部世界,他们从西方思想武库中寻找武器来解剖中国社会及面临的诸多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竞逐、自由争鸣的盛况,改变了步入近代前那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对工商业的强调及农工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等无不得益于西方文化的馈赠,而兴农学、设农会,运用现代科技和经营方式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更是凸显出西方文化的色彩。孙中山在清末即开始从生产力的角度解释从重农到重商转变的原因,体现出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

总之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既从传统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又以博大的胸襟去接纳外来文化,努力做到融汇百家、取精用宏,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四是农工商并重。尽管恪守“重农抑商”古训,顽固地主张轻商、抑商的不乏其人,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种人在近代实在是寥若晨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逐步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既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也是实现国际竞争中使中华民族得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当然要求。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础地位,感到任何轻视、忽视农业战略地位的思想都是短视的,其实践将是有害的,灾难性的,因而都在

① 《澗于集·奏议》卷1,《屯田实边折》,转引自陈勇勤《光绪时期清流派对农业有关问题所提建议及其务实性》,《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

② 《黄兴集》第156页,引自李卫东《黄兴农业思想初探》,《江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一定程度上予以关注,主张农工商各有其重要地位,必须科学认识,合理安排。

(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农思想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特点,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就近代中国而言,知识分子对农业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重农到轻农(相对而言)再到重农的演化过程。鸦片战争后,尽管有少数先驱者开始冲决“重农抑商”的樊篱,认识并揭露抑商的危害,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因为因袭传统太深而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步履艰难。更有少数人酣嬉鼾卧,漠然若无所见闻,因此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被有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仍然还是用中古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和解释洋夷与中国的关系,并准备继续以中古式的武器和战术来应付未来的冲突。”^{[9] (第1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曾“雨过忘雷”,在鸦片战争后重新昏昏睡去的知识界终于苏醒。他们心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努力寻求强国富民之策,以免遭淘汰的厄运,尤其是他们看到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的巨大变化,大声疾呼国富而后能强,主张否定封建“农本论”,重商兴工。郑观应提出“十万富商,胜于百万劲卒”,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实力对巩固国际的保障作用。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提出的重商思想,无疑正是对传统“重农抑商”教条的反动。改变积贫积弱国情的急切心理和对传统的强烈反感构成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基础。

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的频繁和认识的逐步加深,西方文化本身的流派纷呈、百说竞逐展现在国人面前,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其简单化、绝对化的认识,西方的重农思想与重商思想并存也有助于改变那种重农与重商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更加合理的、比较科学的产业结构体系。另外尽管中西国情不同,历史和传统文化各异,但对相同问题的认识,只要遵循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会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因为对相同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并不因种族、国籍、肤色等方面的差异而会有所区别,农业地位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不能不重视农业。

19世纪90年代,张謇、张之洞等人看到农业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提供发展民族工商业所需原料,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重商论又为农商并重论所取代,表面上看似似乎又回到了19世纪40年代的重农,但实质上却是对农商关系重新理性思索的结果,它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是一次扬弃:否定之否定。

其次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而言。众所周知,人类摆脱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首先和主要是通过农业的进步发展来完成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0] (卷2, P169)} 农业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源泉和动力,这就为重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先秦时代,在思想界,重商者亦不乏其人,然而,在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秦王朝建立后,地租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经商本身具有流动性,商人财产又难以估算,对商人始终未能实施一种行之有效的、长久的收税方法,尤其是到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日益巩固和强化,思想界的专制也相伴而来,与政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适应,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也正式确立。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其它思想在专制淫威下显得那么虚弱和无助。于是“重农抑商”成为延续几千年的“国策”。明清以降,封建专制统治逐步衰落,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贸易的逐年上升,海关税、厘金数额不断增加,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农业的衰落又使赋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这也使农业的重要性被低估。而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在西方文化面前败下阵来,合法性受到怀疑又为其它非主流思想的复出提供了可能,预留了空间,于是在思想界“重农抑商”的几近垄断的地位开始丧失,本末皆富、农商并重、农工商协调发展等思想也破墙而出。

(五) 重农问题充分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

重农问题往往是与如何处理农商关系、义利关系、俭奢关系等密切相联的。我们虽然可以根据对农业的地位以及其与工商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大致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划分为重农抑商派、工商立国派、农工商并重派等,但实际上这仅具相对的意义,因为归入同一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丰富多样的,彼此间并不完全相同,而过去人们所指称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此问题上却失去

其群体意义,有时彼此间的差异并不比与其他派别知识分子的区别更小,如严复之与梁启超、康有为,陈炽之与郑观应,章炳麟之与孙中山、黄兴,因此任何简单地以其政治主张为依据划分营垒的方法都是不足取的。

[参 考 文 献]

[1] 赵树贵. 陈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 伍杰. 严复书评[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3] 曹从坡, 杨桐. 张寒全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4] 孙中山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 穆藕初. 穆藕初文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6] 陈勇勤. 光绪时期清流派对农业有关问题所提建议及其务实性[J]. 中国农史, 1994(3).
[7] 李卫东. 黄兴农业思想初探[J]. 江汉大学学报, 1996(1)
[8]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中华书局, 1981.
[9]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责任编辑] 陈少华

* 书 讯 *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出版

由郑州大学王星光教授编著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一书, 于 2004 年 9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生态学、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资料和综合研究的方法, 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 旨在探明生态环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早期文明中心、并进而建立起夏王朝过程中的实际影响。

该书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古生代、中生代到第三纪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加以长时段的描述, 提出第四纪更新世以来较有利的生态环境促成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该书阐述全新世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变迁及其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指出在距今 8500— 3000 年的“仰韶温暖期”内, 从新石器时代革命、粟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直到夏王朝的崛起, 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利的生态环境成了中华文明演进的中心舞台。该书对《夏小正》进行了循名责实地探研, 认为生态环境恶化是夏王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为该书作序, 指出: 该书“叙述详明, 层次清楚, 在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来论证有关问题时, 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又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

该书可供关注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农业史、生态环境变迁、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学科的读者借鉴参考。